



穆尔西将沙特作为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地。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展，主要看埃及和沙特，看它们如何协调宗教权威、君主权威和体制权威的关系。

## 两种轨道：阿拉伯的选择

纵观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历程，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双轨现象：一个是从假共和到真共和的迈进，一个是从绝对君主到君主立宪、再到象征性君主的演变。这两种道路都可能成功，但前者走得肯定比较艰辛。在阿拉伯地区，存在一个永远难以协调的权威问题。推翻君主、建立共和，意味着一切重来，肯定会遭遇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挑战，最后在宗教势力和军人的博弈中走向体制权威，比如埃及和土耳其。在这类国家中，军人的世俗权威和伊斯兰的宗教权威相互对立，而在君主制国家，最高宗教领袖、最高世俗领袖往往就是国王一个人，是君主权力和宗教权威的嫁接，比如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

目前的阿拉伯世界大体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各阿拉伯行省。当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轰然解体后，它的阿拉伯诸省份被当时主导西方世界的英法分割，叙利亚和南部小亚细亚划入了法国的势力范围，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则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区。法国和英国根据自身的模式，分别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议会制共和国与君主政体。在中东当时新独立的国家中，只有少数是具有延续性的历史实体，并拥有长期独立的经验，比如埃及和摩洛哥，沙特虽然是经由征服不同部落和地区而成的新国家，但具有皆为阿拉伯人、大都是逊尼派穆斯林的同质性。而更多的国家则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间挣扎，教派复

杂，长期陷于内斗和冲突。在阿拉伯君主国家，同时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王室的合法性问题，王室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否持久维持。于是，有些阿拉伯君主得以维系，而有些则被无情地推翻。我们可以挨个数一数阿拉伯国家君主的命运。

埃及被推翻的法鲁克王室属于穆罕默德·阿里建立的王朝，而穆罕默德·阿里出身于阿尔巴尼亚，是19世纪上半期奥斯曼帝国派到埃及同法国人打仗的总督，外来的君主谈何合法性和权威？这个王朝最终在1952年被推翻。利比亚的伊德里斯国王本来就不是个君主，他原本是在此存在了几百年的宗教团体赛努西教团的世袭领袖，二战后联

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一个利比亚联合王国，于是把他推上了王位，他对当国王本来就没多大兴趣，1969年卡扎菲领着一群小伙子轻而易举就把他推翻了。也门原来是阿拉伯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宣告独立的国家，但是它的部落政治非常厉害，内部纷争不断，王室的控制能力差，更经不住纳赛尔出兵干涉，最终覆灭了。

还有伊拉克。这是奥斯曼帝国的东部三省拼凑的一个国家，北部是库尔德人，中部是逊尼派，南部是什叶派，根本就不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靠部落征服自然形成的国家。为了统治这个新国家，英国人把被法国人赶走的叙利亚国王费萨尔弄过来当国王，这个外来的王室规模很小，几辆马车就把整个王室拉到了巴格达。1958年伊拉克爆发革命，卡塞姆领导的起义军血腥地将这个小王室斩尽杀绝，连幼儿都没有放过。血腥的革命就要付出血腥的代价，卡塞姆本人没过几年就被乱枪处决，而曾经刺杀卡塞姆的萨达姆最后也被推翻并被吊死。由此可见，凡是以暴力革命打断原有社会发展进程、试图建立崭新秩序的国家，一定要经过更多的曲折、付出更大的代价和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

反观站住脚跟的君主制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天下都是君主自己打下来的，自然有其合法性。比如摩洛哥，阿拉伯人自7世纪起就在这里站住了脚，王室是随着阿拉伯人征服北非打进来的一支力量，现在的阿拉维王朝已经延续了350年，正在不断地向欧洲式君主立宪模式发展。在摩洛哥，国王只掌握军权，国王以前有权解散议会，现在是总理有权解散议会。摩洛哥所有的政党、包括换了名称的穆兄会和共产党，都支持国王，都认为自己的体制是阿拉伯世界中最好的。

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展，主要看埃及、摩洛哥和沙特这三个国家，看它们

如何协调宗教权威、君主权威和体制权威的关系。未来比较合理的状态还是政教分离，宗教绝对权威和君主绝对权威逐渐转变为体制的权威。在阿拉伯世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教分离的共和制和政教嫁接的君主立宪制两条轨道，现在很难说哪一条轨道好，只能说君主立宪的代价小一些，像英国的君主立宪道路付出的代价就比经历了一次次革命的法国的代价小，“阿拉伯之春”对中东八个君主制国家的冲击也小很多。

有学者在谈到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时说，无论在哪里，革命胜利后都迎来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当前也是一样，穆兄会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崛起，肯定会使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深受鼓舞，伊斯兰党派很有可能在更多阿拉伯国家走上政治舞台。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更在疑惑中东将何去何处，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与政治生活难解难分地缠绕在一起。约翰·埃斯波西托在《谁代表伊斯兰讲话？》中这样写道：根据调查数据，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大部分人认为宗教是他们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绝大多数人希望沙里亚至少是“立法的一个渊源”。在约旦、埃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国，大多数人甚至希望沙里亚成为立法的“惟一渊源”。注意，在全球10亿之巨的穆斯林中，只有20%左右生活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最大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在沙特、埃及或伊朗，而是在印尼、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欧洲、美国和加拿大也有数百万的穆斯林。在这些地方，伊斯兰主义有自己的版本。

可以说，“阿拉伯之春”为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穆兄会借政治剧变，利用民主机制群体性崛起，是此次阿拉伯世界剧变的标志性特征。穆兄会在后威权时代的强势崛起，反映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以及政治文化的

内在机理，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长达数十年的威权统治，使阿拉伯国家政治结构严重畸形，呈现世俗威权政权与政治伊斯兰的二元结构，具有显著的极化特征，二者之间缺乏自由民主力量、公民社会等具有现代性的“中间力量”。世俗政治力量的弱小，成就了穆兄会的崛起。埃及、突尼斯等国的自由民主派和公民社会羸弱，不仅不是穆兄会的对手，甚至无力与萨拉菲派抗衡。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宗教性，也使穆兄会可以凭借其源于宗教的合法性，开展政治动员。此外，穆兄会作为政治反对派，长期遭受威权政权的残酷打压，为其蒙上了殉道者的悲情色彩，博得民众的广泛同情。穆兄会效仿左翼政党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结构，从中央到基层分为四级，设有职能相当于中央委员会的协商会议、相当于政治局的训导委员会以及相当于党首的总训导师。严密的组织结构使其能够有效地进行政治动员。

可以预见的是，政治伊斯兰在阿拉伯世界的崛起之势还将延续。利比亚穆兄会、伊斯兰变革运动等政治伊斯兰势力在推翻卡扎菲政权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望成为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也门政治过渡进程顺利进行，伊斯兰改革党也有望赢得选举。然而，埃及等发生剧变的国家一直乱象丛生，经济羸弱不堪，穆兄会将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今年5月，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失败，说明宗教属性不能确保穆兄会逢选必胜，进而上台执政。

穆兄会将使阿拉伯国家沐浴在“阿拉伯之春”的阳光中，还是将其带入“伊斯兰寒冬”，不仅关乎穆兄会的政治前途，还将决定发生剧变的阿拉伯国家的未来走向，其崛起之路是否坦荡，对于近代以来在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上不断试错的阿拉伯世界，同样至关重要。■